

## 「去政治化的政治」與大眾傳媒的公共性<sup>1</sup>

汪暉

### 摘要

在全球化和市場化條件下，當代中國和世界正經歷着一個去政治化過程。作者以「去政治化的政治」這一概念描述當代政黨政治、國家角色和其他二十世紀形成的政治形態的蛻變和轉化。文章從「去政治化的政治」的角度分析了大眾傳媒的公共性危機。

關鍵詞：去政治化，公共性，大眾傳媒，國一黨體制，階級

---

汪暉，北京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興趣包括中國思想史研究和中國現代文學等。電郵：w-hui@tsinghua.edu.cn

## **Depoliticized Politics and the Question of Publicity of Mass Media**

WANG Hui

---

### **Abstract**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world are going through a process of depoliticization in the condition of glob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The author uses the concept of “depoliticized politics” to describe the metamorpho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party politics, the role of the state and other political formatio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risis of the publicity of mass med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politicized politics”.

**Keywords:** depoliticization, publicity, mass media, state-party system, class

市場化和全球化條件下媒體的角色及其演變，是和這一時期的獨特政治狀態聯繫在一起的。我把這個政治狀態概括為「去政治化的政治」。這裏簡要地勾勒這一「去政治化的政治」的主要特點，而後以此為背景分析大眾傳媒的公共性危機。

## 「去政治化的政治」與國—黨體制的轉變

黨—國體制是現代政治組織和現代國家體制的主流。統治權從傳統的君主轉化為現代的政黨是政治現代性的根本特徵。一黨專政與多黨政治均以現代黨—國體制為基本框架，在這個意義上，上述兩種國家模式均可稱之為黨—國，概莫能外。「如果在現代寫一部新的《君主論》，其主人公不會是一位英雄，而只能是一個政黨。具體點說，是在各個不同時期，在每個不同民族的不同的內部關係中，致力於建立一個新型國家的那樣一個黨（為了這個目的而建立政黨，這是歷史的要求，理智的要求）。」（葛蘭西，1992：341）

二十世紀中國政治與政黨政治有着密切的關係。在漫長的歷史時期裏，政黨政治並未全盤被納入既定的國家政治的軌道，但建立不同類型的黨—國體制始終是這一時代政治發展的基本問題，這是因為作為一種政治行動的政黨政治，總是按照自身的價值和理想投身於創造新型國家的政治實踐。隨着政黨在執政過程中逐漸地變成了國家體制的主體，政黨與它們各自的社會基礎的關係不再是清晰透明的，政黨的政治理念與其政治實踐的關係也日益缺乏內在連貫性。簡言之，政黨體制包含了雙重轉化，即，一、政黨自身處於一個「去價值化」的過程之中，政黨組織的膨脹和政黨成員在人口中所佔比例的擴大並不能代表政黨的政治價值的普遍化；二、政黨日益向常規性的國家權力滲透和轉化，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去政治化的」和功能化的國家權力機器。

我將這一雙重演變概括為從「黨—國體制」向「國—黨體制」的轉化：前者包含着一种政治性的態勢，而後者則專注於權力的鞏固。在當代的政黨國家化過程中，政黨已經被視為一個已完成和定型的、與國家一樣扮演着中立的、協調不同利益的功能的體制。從西方體制的角度

看，過去二三十年來，構成西方國家民主的基礎，亦即政黨以及以政黨為前提的議會制，正在被瓦解；多黨制的前提是有明確的代表性及其政治價值，它通過在國家框架下的特定的制度安排，形成黨派間的相互競爭。然而，如果政黨及其代表性愈來愈模糊，議會政治與市場活動的關係愈來愈密切，實際上也就取消了真正的民主政治。在這一條件下，議會也從某種公共領域轉化為國家體制的穩定的機器。因此，所謂民主的危機即政黨政治的危機，而政黨政治的危機則是「去政治化」的歷史過程的結果。就中國政治而言，社會主義國家—政黨體制與多黨議會民主制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論預設和政治實踐，它脫胎於「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行動，認為國家即階級統治的暴力機關。但伴隨着對於「文革」的否定和改革時代的到來，這個建立在階級概念之上的黨—國體制也發生了深刻變遷——從「三個代表」到「和諧社會」，所有這些執政黨的理念都試圖體現和代表整個社會的利益和意志，而不是從特定的階級代表性角度展開的命題。

在「去政治化」的條件下，國家以發展為由將最終的原則訴諸於社會穩定，從而很大程度上取消了二十世紀政黨政治的「路線鬥爭」模式，以及與之伴隨的政治性的理論辯論——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初期，圍繞着如何理解歷史及其動力，如何理解商品、商品經濟、勞動和生產方式，如何理解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關係(尤其是圍繞「唯生產力論」的爭論)，如何理解階級和階級鬥爭，如何理解價值規律和資產階級法權，如何理解中國社會的性質及世界革命的形勢，如何解釋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不同的政治觀點和政治力量進行了激烈的交鋒。如果把這一時代的理論辯論與先前一切時代的理論辯論加以比較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從未有過任何一個時代的理論討論像這個時代一樣，超出精英、宗教、政黨或國家的範圍，成為全民性的事件。但伴隨八十年代的終結，我們已經看不到共產黨內有關政治價值和政治路線的公開辯論。這並不是說不存在思想的爭論，但其一，這類爭論主要地不是發生在政黨體制內部，其二，當知識分子的思想爭論對國家的公共政策產生作用和影響之時，爭論本身已經轉化為有關治理的技術性分歧。事實上，以媒體控制為例，我們很難從當代的媒體控制中發現一個明確的意識形態特徵，控制的對象

在價值上、意識形態上經常完全相反，這是一種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去政治化」條件下的權力操控。

「去政治化」這個概念當然需要更仔細地加以討論，它的動力究竟是什麼，也需要認真探究。事實上，絕對的「去政治化」是不可能的，在當代世界和中國也仍然存在政治性的空間。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觀察共和國歷史上曾經存在的一些特殊時期，即不同的思想和政治觀點能夠公開辯論的時期，以及這個時期最終消失的過程和機制。我認為「去政治化」並不是一個局部的、僅僅發生在過去三十年的時段中的歷史現象，毋寧是在歷史中反覆出現的現象。這裏只能簡要地做點解釋：

首先，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建立在一種政治與經濟的區分的假說之上的，這一假說反映了早期資產階級擺脫封建國家和地主階級對政治和經濟的壟斷、支配和暴力佔有的歷史意志。熊彼德曾用「政治交換」這一概念論述早期資產階級的權力構成：「如果沒有某個非資產階級實體的保護，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就會陷於絕境，不但無力領導它的國家，甚至不能保護本階級的特殊利益」，即使在民族國家時代，在那些政治權力的擁有者——某些貴族階級——將自己轉化成為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並為資產階級進行戰鬥的過程中，政治機器與資產階級之間也不是沒有界限的 (Schumpeter, 1954: 135-137)。當代中國的權錢交易也是如此：一方面國家權力已經將自己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的調節機器，但另一方面在權力擁有者與資本擁有者之間也並非毫無界限，從而「政治交換」總是必須的。

政治與經濟的分離作為一種訴求，產生於資本在與政治權力進行交換過程中力求獲得更高權力份額的欲望。在漫長的十九世紀，那種政治與經濟相互分離的早期資產階級訴求逐漸地轉化為國家和超國家體制對於市場經濟模式本身的塑造；由於資產階級將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集於一身，政治安排也隨之被轉化為市場經濟的法則本身，即政治領域成為一種從屬於經濟活動而又似乎外在於經濟活動的領域。以政治與經濟的分離為中心，現代資本主義試圖創造一種自我循環的市場經濟及其「去政治化的」秩序；如果說這一訴求的歷史合理性建立在重商主義時期中小企業主階級抵制國家、貴族和君主壟斷的過程之

中，那麼在金融資本時代，這一訴求已經蛻變為以金融資本為龍頭的大資本(及其代理人)操控經濟和社會的要求。

其次，從政治的角度看，當資產階級通過聯合無產階級和其他社會階層發動政治革命推翻國王—貴族權力之後，亦即當國家成為「一個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管理委員會」之後，一種去政治化的程序性的國家政治逐漸取代了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多樣化的政治格局。在這一新的政治架構下，政治交換關係是以「去政治化的」方式進行的。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雙重現象和雙重過程，即社會分化和經濟剝奪仍然在深化，但無論是新的經濟關係的形成和針對這一新的經濟關係的修正，均被納入程序化的、常規化的法律與制度形成之中。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國家逐漸從政治領域向常規化的權力結構的轉化，並力圖將自身轉化為一個中立的管理機制。正如早期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樣，國家在市場形成過程中扮演着最為關鍵的作用，但政治與經濟的分離不但是一種口號和目標，而且也為一種去政治化的政治提供了歷史理由。在政治與經濟分離的原則之下，通過將非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和勞動分工模式貶低為「政治干預」的產物，七十年代末期以來佔據主流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為市場經濟向政治、文化和其他社會領域的無限擴張提供了一種「去政治化的」、「自然的」或「自生自發的」表象。

值得注意的是：「去政治化」過程本身仍然是一個「政治交易」的過程，因為作為管理機器的國家仍然包含了雙重性——傳統政治精英力圖將自己轉化為新富階層利益的代表，但他們仍然掌控着政治權力，資本的力量必須通過特定的「去政治化的」交易形式換取權力機器的支持。「新權威主義」思潮可以說就是這一「政治交易」的理論闡述。從熊彼德的「政治交易」轉化為當代世界的「去政治化的權力交易」，這一新的發展建立在如下前提之下：一，在市場化和私有化過程中，權力與資本之間的分界逐漸模糊；二，在全球化條件下，民族國家逐漸地將管理經濟的部分權力與超國家的市場體制(WTO等)關聯起來。這兩個發展為七十年代末開始、八十年代興盛、九十年代風起雲湧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提供了歷史基礎。我認為當代世界的「去政治化」過程正是從這個歷史轉變中產生的政治現象：通過將新的、政治性的安排置於

「去政治化的」表象之中，新的社會不平等被自然化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針對這一不平等的社會安排的批判必須以形成「重新政治化」的條件為前提，亦即以打破「去政治化」的表象為前提。

## 媒體的公共性、階級性與利益集團的關係

大眾媒介（尤其是新聞媒體，比如報紙、電視、廣播等等）在現代社會扮演重要角色，大家對它的主要期待之一，是它的公共性。媒介的公共性是和社會的知情權、社會溝通的基本方式，以及政治運作的基本方式密切相關的。

媒介的轉變既是公共領域發生轉變的結果，也是推動公共領域發生轉變的動力。關於公共領域這個概念，已經有很多討論。比較重要的是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性轉化》中做出的，它被界定為一個介於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領域，它的基本原則是參與性的、平等的和理性的對話，平等表現在任何人都可以進入（非排他的），任何人都平等的成員，對話必須是在平等基礎上的理性的對話。稍早一些，漢娜·阿倫特用公共空間這個概念描述相近的領域（漢娜·阿倫特，1998）。在王權社會，王公貴族、皇室都是處在社會頂層的特權階級，它們以公共的名義代表整個社會。因此，公的領域與國王的私人領域是重疊的。在中國的語境中，公的領域與官的領域也是重疊的——在皇權制度的條件下，官的領域與皇權的領域之間沒有嚴格的分化，因此，官雖然也有某種公共性，但仍然是和所謂一家一姓的私人領域密切聯繫着的。明末清初黃宗羲以「天下之大公」為判準，揭露「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的君主之大私，要求臣為天下而非一姓而工作，就是在公私之間展開的新思想。從這個角度也可以說，早期的公領域建立在排他性的和等級性的關係上。

但這個命題並不表示現代的公領域已經完全是平等的和透明的。法國大革命以後，西方社會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王權為共和所取代，貴族制度逐漸衰敗，社會構造重組了，不同的社會等級——尤其是資產階級——進入了公共領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工業革命和印刷技術的普及拓寬了媒體的領域，改變了社會關係的模式，資產階級

控制了國家、經濟的命脈，而公共領域的性質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因此，我們至今談論公共領域時常冠以資產階級的公共領域，就是指這個歷史轉變。資產階級與公共領域或公共性這兩個概念的重疊，顯示了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特點。資產階級在誕生之初廣泛地代表了各個社會等級的需要，尤其是非特權社會的需要，從而能夠宣稱它所主導的這個領域是普遍的或公共的。隨着資產階級國家權力和資本主義社會體制的確立，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公共性本身也經歷着歷史性的變化——公共性從一個戰鬥的口號，變成了一個體制的合法條件。

因此，對於公共領域的公共性的疑慮，首先來源於對資產階級的普遍代表性的懷疑，它集中在這一問題之上：公共領域的平等原則在實質上是平等的嗎？這裏已經隱含了兩種平等概念即形式的和實質的，例如由於政治、經濟和其他背景的差異，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真正自由地參與到公共空間裏，雖然在原則上，這個公共領域必須是平等的。這個公共性的問題不僅存在於媒體空間，而且也存在於對國家結構的理解之上。資產階級國家把自己視為公民的代表，但工人階級及其代表們懷疑它其實只是資產階級的代表，社會主義運動對於資產階級國家的懷疑就是從這裏開始的。對於媒體的公共性的追究是同一過程的產物。這也是為什麼對於公共領域的公共性的懷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和階級性問題密切相關的，即公共領域是公共的或是階級的？在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運動中，馬克思主義強調傳媒的階級性，而自由主義則延續了十九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普遍主義宣稱，強調傳媒的公共性。這兩種學說都承續了法國大革命的平等原則，但各有各的立場，馬克思主義試圖揭示的是資本主義的公共性概念本身的遮蔽性，但這個質疑本身與現代平等觀是相關的，即從階級的視野揭露資產階級公共性的排他性和等級性。

今天來看，國家除了其統治階級的特性之外是否還具有其公共性，以及如何理解這種公共性，仍然是值得討論的問題。現代社會不是一個有着嚴格的等級制的社會，階級的劃分也不像貴族制時代那樣截然分明，像歐洲封建時代那樣描述公共領域與階級的關係不再是恰當的。但現代社會中的等級的或階級的差別及其與國家政治的關係，



仍然是一個基本的現實。從公共領域來看，也絕不是什麼聲音都能夠在新聞報道和媒體中出現——什麼聲音能夠出現，什麼事情不能出現，即使不能簡單地歸結為階級問題（我這裏指的是古典意義上的階級概念，即與財產權和門第直接相關的階級概念），也總是和社會等級和權力關係相關的。因此，一種更具彈性的政治視野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媒體背後的支配權力。媒體是各種社會力量鬥爭的場域，從認識論的角度說，透明性、自由等概念無法概括和分析媒體實踐，恰恰相反，只有建立一種政治的視野才能理解媒體實踐——無論是媒體的公共性，還是媒體的遮蔽性。以美國為例，一方面它有新聞自由，另一方面它也有新聞自由的限度，在國際問題上，比如伊拉克戰爭，我們能夠聽到批評性的聲音，當然更多的是支持戰爭的聲音，但這兩個不同的方面均不能簡單地從透明性和新聞自由的角度加以分析，而應該從政治性的角度加以分析，即哪一種政治，包括媒體工作者的政治，使得批判性的聲音能夠浮現，又是哪些政治性的干預，限制了這種批判性的聲音。在世界範圍內，對媒體的自由空間而言，國家的控制和利益集團的操控始終是最為有力的干預性和限制性力量。

政黨和政治集團、利益集團對傳媒的控制是非常明顯的。報紙、電視或其他媒體，總之，愈是主導的媒體，愈有可能淪為政黨和集團鬥爭的工具，它們的背後是政黨、政治集團、大公司或其他利益集團。在傳統的黨—國體制下，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喉舌；在八十年代的轉變之中，對於思想討論的干預主要來自黨—國體制；但在市場化條件下，媒體面臨的是國家與利益群體的雙重控制。由於國家已經處於市場關係內部，因此，即使是以國家甚至政黨形態出現的干預，也可以分析出背後的利益關係。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有那麼多人——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對大眾媒體持有強烈的批判態度。公共領域從法國大革命以後發展出來，又慢慢重新封建化，理論上講就是走的這個路子。

在市場條件下，除了國家、政黨、政治集團和利益集團的直接支配之外，媒體的商業邏輯對媒體的公共性影響很大。這個商業邏輯並不是指媒體可能受到利益集團的影響，而是說大眾媒體在市場條件下運作，它有自身的獨立的利益——媒體也成為一個獨立的利益集團。

在這個邏輯的支配下，媒體必然會產生出影響其獨立性和批判性的雙重取向：第一，出於保護自身利益的需求，媒體經常與國家、政治集團或其他利益群體達成妥協，例如對國家壓力作出妥協，掩蓋、修飾或重構一些重要的事件，以免引起國家或其他利益集團對媒體的報復。這個邏輯與前述的公共領域的重新封建化是密切相關的，不過我在這裏特別強調這一現象與媒體自身的經濟利益的關係；第二，為了爭取發行量或廣告收入，媒體必然會以取悅大眾為取向——取悅大眾的方式各式各樣，例如明星炒作，又例如危言聳聽，等等。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我們可以發現一種新現象：很多知識分子和大眾都批評媒體，後來媒體自己也批評自己，但所有的人又都在看媒體，花邊新聞和那些最糟糕的惡意攻擊比電視劇還吸引人。總之，人們一方面覺得它很骯髒，一方面又被它吸引。為什麼媒體在遭到強烈批判的情形下仍然會繼續那種混亂的邏輯？這是和商業邏輯密切相關的。在這一點上，媒體不可能單獨地運作，在大眾和媒體之間有着共謀關係，即大眾對媒體罵聲一片，但罵的同時很多人還會去看，這是一個糟糕的趣味形成過程。

## 媒體「去政治化的政治化」與新秩序

媒體問題是與民主——尤其是社會參與——的問題密切相關。沒有參與性的民主，只是空洞的形式，很容易淪為特定勢力操控的形式，而操控首先表現為對公共領域的操控，媒體正是公共領域的主要形態之一。因此，問題的癥結在於：公共領域是民眾參與的途徑和前提，但又是不同力量角逐的場所，而在國一黨體制與市場社會條件下，黨派、特殊利益集團和國家擁有進入和操縱公共領域的能力。儘管這三者之間以及每一範疇內部均存在矛盾和衝突，但它們以不同方式形成對公共討論和民眾參與的壓抑則是普遍性的現象。在這個意義上，媒體的公共性不是一個自明的概念，而是社會參與的訴求本身。「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爭論的核心問題之一是如何理解公共領域和媒體，但我認為這個爭論絕不應該被歸結為要不要公共領域或要不要新聞自由，而應該被歸結為承認不承認公共性背後的權力關係，要不要

去揭示那些公共性宣稱背後的利益關係。如果承認這個權力關係，那麼，真正的問題就是爭取大眾傳媒的公共性以及如何理解這個公共性。在這個意義上，爭取公共性和更大程度的透明性與持續地揭示媒體的遮蔽性是並行不悖的，沒有後者也就不存在公共領域擴展的可能性。

我在這裏舉兩個例子。在美國的伊拉克戰爭的報道中，美軍每有士兵傷亡都會成為事件，而成千上萬的伊拉克人的死亡——究竟死了多少，在哪兒死的，如何死的，由誰打死的——則幾乎得不到重視。這個美國媒體在戰爭報道方面的遮蔽性，如今也傳染給我們的媒體了。再比如，在我們的媒體中，甚至在我們為爭取言論自由的鬥爭中，問題經常集中在某些精英階層的發言權問題上，工人、農民的發言權問題，其實常常是在人們關注的問題之外的，似乎他們的聲音與言論自由問題無關。例如，2000年中國加入WTO，中國的媒體一片歡騰，說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必經階段，從此中國的民主化就有希望了。我那時正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做客座研究。西雅圖的抗議示威和後來的一系列社會壓力，迫使美國國會不得不把一些中美協議的內容透露出來安撫公眾。如何從整體上評估中國加入WTO的得失，不是我要討論的問題，但它的協議的形成涉及成千上萬甚至上億中國人的生活，但我們在媒體裏面看到過農民利益的代言嗎？為什麼這一強制性安排會被解釋為民主的進步？

再以農民工問題的報道為例。現在許多學者、知識分子和媒體都在呼籲善待農民工的問題。我們聽見的是農民工自己的呼籲嗎？不是的。如果我們認為這種呼籲已經是透明的，那麼，我們也就可能陷於自我遮蔽的境地。以孫志剛案為例，一方面，孫志剛案件受到重視是一個社會的進步，它標誌着社會參與性和媒體公共性的成長，這一公共討論的意義是極為重大的；但另一方面，這個參與性本身也顯示自身的限度。孫志剛是個大學生，有一定的社會身份，他的慘死獲得了廣泛的注意。打死他的收容制度存在了不是一天兩天，受到傷害的農民工數量眾多，這麼長時間為什麼沒有報道呢？有關孫志剛和農民工問題的報道中隱含了一種社會身份論，這是為媒體的道德批判姿態所遮蓋了的。此其一。

其次，知識分子和媒體主要是在人權和權利平等的範疇中談論農民工問題和戶籍制問題，這是一個正當的、應予注意的問題。但在談論這些問題時，很少有人追問：為什麼這麼多農民工離鄉背井，甚至願意忍受奴隸般的生活？一旦提出這個問題，農民工問題就不僅僅是一個城鄉權利不平等的問題，而且還涉及市場化過程及其特定的制度安排的問題，以及市場擴張過程中的農村破產問題。因此，在討論身份制度的解放之時，我們也需要討論有關戶籍制與沿海經濟對自由勞動力的需求是怎樣的關係？

第三，在市場意識形態的支配下，對自由勞動力的限制是成問題的，而對自由勞動力的經濟的、甚至超經濟的剝削卻是正當的。勞動權利在我們主流意識形態中是一個稀缺的概念。勞動法頒佈十多年了，但是國家對勞動法的執行與它在落實知識產權方面的努力簡直不成比例。許多中國公司和在華跨國公司利用這種對於勞動權利的漠視拒絕在公司內組織工會，進而為它們對工人權利的剝奪提供了有利條件。在今天中國的市場條件下，即使是白領階層，也承受着難以想像的壓力，工作超時大量存在，晚上很晚下班，經常週末加班，社會保護很差，很多人進入公司不敢提出簽約——不能簽約就形不成你的法律保護。經過多年的討論之後，勞動合同法終於得以頒佈，但其實行仍然困難重重，而媒體輿論卻常常向着資本傾斜：勞動合同法提高勞動成本，使中國失去競爭力。

在這些問題上，媒體的表面進步顯示出非常大的局限性。要想讓那個無言沉默的社會發出聲音來，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對媒體最大的挑戰。持續地揭示這些報道的遮蔽性絕對不能也不應轉化為一種虛無主義的態度，即否認任何公共性的可能性。透明是一種訴求，是一種不斷擴展的過程，但也是一種永遠無法抵達的目標。

## 網絡傳媒作為社會性的空間

媒體在歷史中持續地發生變化，促成這些變化的因素包括技術的進步和社會構造本身的變遷，網絡的出現是當代媒體變化的重要標誌。孫志剛的案子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社會問題，都是通過網絡透露給

公眾的。這至少可以證明技術進步與社會結構的變化——包括權力關係的變化——之間是互動的。網絡的好處是相對的自由，在控制比較嚴密的社會裏，哪怕是一點點的新空間都得不之不易。例如，2005年由郎咸平引發的關於國有企業改革的大討論就值得注意：這場討論在網絡世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進而形成了新的公共輿論，不但引發了其他媒體的跟進報道和討論，而且也形成了一場有關中國改革道路和方向的政治性辯論。我說這場辯論是政治性的，理由有三點：第一，這場爭論的核心是當代中國的最大的公共事務之一即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它涉及全社會的利益安排，也涉及政治與經濟在當代中國社會的關係問題；第二，參與爭論的人擁有不同的觀點和立場，而這些觀點和立場清晰地呈現了各自的階級的和社會的利益關係和價值取向；第三，這場辯論已經導致一些利益群體試圖利用他們與權力的關係取消包括郎咸平本人的發言權的政治行動。這種對於輿論的壟斷是政治性的。當然，這場討論的政治性是不完整的，原因是：一，各種觀點的代表性並沒有以直接的政治形式表現出來，從而我們不能確保這場討論的民意取向對於公共政策的實質影響；二，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的精英同盟正在努力壓制和取消爭論本身。

在這一歷史條件下，網絡的確提供了新的討論空間和新型的公共領域的可能性，但這並不是說網絡媒體可以避免其他媒體的困境。概括地說，網絡媒體有幾個問題：

第一，那些中心性的網絡媒體也會形成相對的主流，它同樣會忽略掉相當多的問題或面對許多的禁區。網絡是社會性的空間，不是價值中立的、完全自由的空間。因此，對網絡輿論同樣需要進行社會的和意識形態的分析。關注哪些問題與不關注哪些問題往往是媒體自身沒有意識到的。由於網絡有自由的表像，從而對於網絡的限度的自覺意識也就更為困難。

第二，在中國和在其他地區，對網絡的監控是一個常態。「九一一」之後的美國，在反恐的名義下，網絡成為監控的主要對象之一；中國的網絡監控也是常態。從一定角度上說，網絡正在將我們的所有私人領域轉化為某種可供監控的領域，這是技術進步和我們對技術的依賴所造成的新的問題。由於存在監控體制，從而網絡媒體也不可避免

地在檢查和自我檢查之間徘徊，這與其他媒體形式差別不那麼大。

第三，網絡媒體並不是向所有人開放的。在網絡時代，社會經濟和技術條件的不平衡可能加速社會的不平等，比如，中國的城市與鄉村上網率完全不一樣，而這個信息不對稱又可能拉大原有的城鄉差距。

第四，網絡媒體的另一問題是責任意識的淡薄。在網絡社會中，流傳着許多沒有根據的流言，這背後同樣存在着操縱。在歷史上，檢查制度的嚴密化是和這類攻擊性的或惡意流言的傳播相反相成的，例如歐洲中世紀的檢查制度就和隱私遭到惡意破壞有關係，它並不僅僅是教皇或某種世俗權力絕對意志的產物。這種情況在全世界是普遍的，不過中國在這方面好像更糟糕。據說有人做過統計，在幾種語言中，網絡中罵人現象出現最多的是中文，這實在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因為它只能導致控制的合法化。現在有些報章根據網絡發表新聞，其可靠性變得更差了。

## 媒體的政治分析

在社會主義時期，最為盛行的政治分析是階級分析。但在當代語境中，階級或階級性的概念不那麼容易確定，在後現代理論的視野中，階級和階級性都可以被歸結為一種建構。但指出這些概念的建構性卻不能取消社會分化在社會分析中的意義。媒體代表誰，對誰說，誰能夠進入媒體，誰構成媒體的讀者，都是值得分析的——傳統的階級概念很可能不夠用了，但必要的社會性和政治性的視野，卻是絕對需要的。現在主流的意識形態將中產階級作為社會的基礎，這一階級概念取消十九世紀政治經濟學所賦予這一概念的對抗性特徵，但並沒有取消階級範疇。因此，今天取消的不是階級概念，而是特定的階級概念。這也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一個特徵。

一般而言，權力、資本和階級的關係是理解公共領域及其面臨的威脅的主要問題。權力是最基本的，資本、階級都會轉化為權力——因此，權力是一個權力網絡、一個不斷流動的網絡。也正由於此，談論資本控制和政治控制不等同於說所有媒體都已經毫無自主性，資本不是整一的，存在着不同資本之間的競爭；社會階層也不是整一的，

同一個階層存在着不同的政治觀和社會理念。由於社會包含各種各樣的成分和力量，事實上的合謀的權力關係也可能展現為某種對立的關係，而這種對立一方面構成了某種空間存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經常成為一種合法性的力量——只有將自己塑造為還在批判或還在反抗的一方才有合法性，而這種合法性反映了新的權力結構，它通過遮蔽一些權力關係、放大另一些權力關係來完成這個合法化過程。比如，有些力量以反對國家支配為幌子遮蓋國有企業私有化過程的真實的利益關係和格局，似乎私有化過程本身不是最大的國家行為似的。通過這種姿態，工人的利益訴求被壓抑了——他們對工廠的捍衛是為了支持國家支配嗎？因此，真正批判性的思維和創造性的媒體實踐既需要通過這些縫隙擴展空間，又不能假裝成批判者或反抗者來加強新的權力結構。

在今天的大眾傳媒當中，這是一個真正的挑戰。如果沒有這個自覺的話，就會在不知不覺間過於輕易地認同一種新型的統治模式。例如，現在大家熱衷於討論私有產權，有關政治改革的討論都集中到這個問題上了。然而，當社會的公共財富瓜分得差不多了，瓜分所得需要合法化的時候，用私有產權的正當論述來論證它，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嗎？有些媒體把它描述成中國社會的進步，好像那些討論者是反對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和極權主義的英雄一樣，但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已經或正在被拋掉，現實存在的已經是一個新的關係。這個反抗的姿態和描述無非是新的權力關係的自我表達罷了。樹立那樣一個沒有真正力量的敵對者，進而將自己的利益合法化——我對這個演化過程沒有任何信任感。

今天維護權利的鬥爭要靠公共討論、社會運動與制度創新的互動，沒有公共辯論、社會運動和社會鬥爭，僅僅靠媒體和媒體知識分子，不可能贏得大眾民主的發展。許多媒體工作者正在努力創造一個另類空間，這個空間要擴大，一定要有社會力量支撐才可以做到。這個社會力量從哪裏來？社會運動的支持，一定程度的社會自我保護機制的形成，社會運動、知識分子和媒體的有機互動，都是力量的根源。二十多年來，一種支配性的說法是將社會運動與「文革」或「大民主」等同起來，認為這將危及社會穩定和發展。從這種語言或輿論，我

們可以知道一種新形式的社會專制是怎麼構成的：一方面把所有這些東西都歸納到「大民主」、「文革」這樣的範疇中去，另一方面又將這個歷史當作「徹底否定」（從而也是不能觸及的）的禁區。在全球化潮流裏面，「冷戰」、「後冷戰」的意識形態起着支配作用，人們必須用一個虛幻的敵人將現實的不平等過程合法化、道德化和去政治化。

前些時，我去藏區訪問，有一個年輕的藏民跑來找我。他說他們在作一些社會協作運動，因為沒有資金，規模很小很小，只有三個村子加入他們的實驗。他們的宗旨是什麼呢？他說：第一是保護生態，第二是保護藏族文化，第三是保護集體所有制。保護生態、保護藏族文化沒有人反對，NGO和國家都支持，知識分子也支持。但保護集體所有制就未必了——在私有化的大潮中，集體所有制不是計劃經濟、社會主義甚至極權主義的同義詞嗎？然而，為什麼在討論保護生態、保護藏族文化的問題時要提出所有制問題？這位藏民的回答是：集體所有並不同於要回到公社制，現在這種強行私有化的方式瓦解了他們的生活方式，抽象地談保護藏族文化，他們就連基本的生存模式都沒有了，還怎麼保護文化？他對制度的思考源自普通的農民在其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體會。

## 大眾傳媒的立場與知識分子的立場

如何將大眾從大眾媒體和大眾文化的幻象中解放出來是一個複雜的理論問題，也是媒體工作者面臨的重要挑戰。印度的「底層研究」提出過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這就是底層能夠發出他們自己的聲音嗎？這個問題可以追溯到葛蘭西對社會集團的霸權地位的闡釋——統治集團不僅聲稱代表了大眾的利益，而且也通過「知識和道德領導權」限制底層發出自己的聲音。早在1844年，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做過一個著名論斷：「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着精神生產的資料……」（馬克思，1972：52）它的意思是說：在特定的階級和社會關係中，佔據統治地位的階級意識形態具有極強



的滲透力，當農民和工人沒有自覺的時候，他們的意識跟統治者的想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們不能夠擺脫統治者的意識形態，所以沒有辦法發出自己的聲音。但是，在討論大眾或底層能否發聲這一問題上，存在着一些明顯的盲目之處。首先，馬克思不僅提出了統治意識形態的問題，而且提出了對自為階級和自在階級的區分，即獲得自覺的階級意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第二，在社會運動中，運動的參與者和領導者很可能並不出身於底層，但在社會運動和社會實踐中，他們與底層融為一體，從而不但能夠幫助自覺的階級意識的形成，而且也能夠代表這個社會運動本身。但是，在當代語境中，尤其是當代的學院和理論狀態中，斯皮瓦克的問題包含着尖銳的批判性。在今天，調查研究，從理論到實踐，再從實踐到理論，這個循環往復的過程對於知識分子和媒體工作者都是必要的，對於打破統治意識形態的霸權也是必要的。

二十世紀的社會運動和社會調查與我們今天熟悉的社會分層研究完全不同：前者不是靜態地分析階級的構成，而是去看這些不同的社會階級對於運動的態度，而後者卻是「去政治化的」或結構性的，它們對社會公正的訴求多半與重申國家現代化的目標密切相關。例如毛澤東在二十年代對農民運動的分析有一個動態的、主體性的視角，一個將相對靜態的社會關係分析轉化為政治分析的過程，從而是從鮮明的政治視野展開的社會分析。我在這裏提及這一點，絕不是否定這些研究對社會公正的訴求及其提供的某種階級或階層圖景的意義和價值，而是希望從這裏出發，重新展現出一種將社會性分析轉化為政治分析的可能性。葛蘭西在做政治力量的對比分析的時候曾經說過：「對於力量對比做任何具體分析的時候，所應該提出的最重要的意見，歸結為一點，就是這種分析不能而且也不應該成為目的本身（只對那不寫以往歷史的人來說是這樣），並且只有在它成為實踐活動和目的明確的創舉的根據的時候，它才具有意義。這樣的分析能夠查明阻力最少的地點，在這些地點運用目的明確的行動可以收到最大的效果；有助於實行具體策略的運用；表明怎樣才能最妥善地組織政治宣傳，什麼樣的語言是群眾最理解的等等。」（葛蘭西，1983：157）

大眾是由各種各樣的群體構成的，只有當這些群體及其政治被重

新激發起來的時候，才有可能形成媒體的多樣性和公共性。公共性必然是政治性的。如果要說積極的發展的話，一些新的社會運動和社會思想的出現，一些媒體工作者、知識分子與社會運動之間的互動，是最值得注意的。2004年秋天，金沙江的農民組織起來，在聯合國和發改委組織的水利開發會議上發出自己的聲音，對於虎跳峽水壩建設問題表達不同的意見，而許多媒體在報道會議時將鏡頭對準了這些農民。在這個場合和瞬間，媒體成為政治性爭論的空間——我說的政治性是不同的利益群體基於不同的價值進行爭論和較量的過程，它必然是多樣的、力圖擺脫控制的、不斷敞開的過程。在像葛全孝這樣的農民身上，你可以發現強烈的政治意識和權利意識——我說的這種政治意識是植根於特定利益群體及其社會網絡中的，它必然地要去尋求相應的價值觀作為其支撐。發展、國家利益、現代化、市場化等「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識形態」對他們而言忽然失效了。他們清楚地看到這些概念背後的矛盾，比如在國家這個概念之下，隱藏着不同層級和部門之間的相互矛盾的價值取向、利益關係，以及各自與市場力量之間的關係模式。正由於此，他們的訴求同時包含了策略性的思考，即針對具體的社會關係提出他們的批評、建議和訴求。這個過程本身充滿了政治性的含義。當然，隨着許多媒體的介入，從什麼角度介入、如何介入、怎樣將客觀的工作倫理與對上述社會過程的分析結合起來，就成為媒體工作者面臨的挑戰了。

## 參考文獻

- 汪暉(2006)。〈去政治化的政治與媒體的公共性〉。《甘肅社會科學》，第4期，頁235-248。
- 馬克思(1972)。〈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頁52)。北京：人民出版社。
- 陳越(編)(2003)。《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 傑奧瓦尼·阿銳基(2001)。《漫長的20世紀——金錢、權力與我們社會的根源》(姚乃強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原書Arrighi, G. [1994].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 葛蘭西 (1983)。葆煦譯。《獄中笥記》(頁57)。北京：人民出版社。
- 葛蘭西 (1992)。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編譯)，《葛蘭西文選(1916-1935)》(頁341)。北京：人民出版社。
- 漢娜·阿倫特 (1998)。〈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汪暉、陳燕谷(編選)，《文化與公共性》(頁57-124)。北京：三聯書店。
- Crumpacker, T. (2006, Winter). *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 and the end of history*. Retrieved January 23, 2009, from <http://www.stateofnature.org/politicsDepoliticization.html>.
- Przeworski, A. (2006). Consensus and conflict in western thought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Revise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2006 Beijing Forum.
- Schmitt, C. (1993). The age of neutralizations and depoliticizations (1929), *Telos, Issue 96*, 130-142.
- Schumpeter, J. (1954).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Wright, E. O. (1997). *Classes*. London: Verso.

## 註釋

1. 本文是根據2004年的一份同題訪談稿改寫而成，請見汪暉(2006)。